



如何写好大时代中的“人”

□张志忠

中国作家对于普通人物的形象刻画、普通人物的命运述写,因为大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加持,创造了宏大的史诗性作品,讲述了独具神韵的中国故事,从文学的角度提供了新鲜的中国经验

有位汉学家曾质疑中国作家为何热衷于讲故事,认为这与现代西方文学趋势相悖。他提到,德语小说家往往聚焦于单一主人公的灵魂深处,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鲜少涉及复杂的情节。中国作家擅长讲述众多人物与丰富故事,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与民族烙印。我回应他,中国作家之所以故事讲不完,是因为他们独特的经历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这些经历丰富多彩,值得书写。

现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中的个人叙事,常常会打上时代的、民族的烙印,呈现出三者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深刻关联性,并且构成独特的中国故事、中国价值。这是因为,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型一经启动,就以其时间上的急骤变化浪涛重叠,启蒙、救亡、革命建设,展现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百余年间亿万普通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被裹挟于其中,个人命运被历史潮流推着涌、回旋着,载沉载浮、悲欣交集。譬如,若不是高考制度重建,许多人的命运将截然不同。为有志考生铺平道路的故事,正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学中个人叙事与时代、民族深刻关联的体现。

遭逢这样伟大的时代,形成“大时代的文学”,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文学命题。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到鲁迅在《〈尘影〉题辞》中所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人和社会的跌宕起伏,花开万朵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写作题材,有这么多的故事可讲,有这么多的非凡经历,有这么多的命运传奇,身处其中的作家何其幸运!

在个人叙事与中国故事的关系上,时代精神为个人命运赋能。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代人往往有着共同的经历,作家们容易形成按照代际划分的不同创作群体。这样的觉察从鲁迅的时代就开始了。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鲁迅和冯雪峰谈到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之一,就是写一部描写20世纪初到30年代之间四代知识分子的划片;推动辛亥革命的章太炎等第一代,这是鲁迅的老师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这一代,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是第二代;在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如瞿秋白等是第三代;1930年代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想文化界新秀,如冯雪峰等是第四代。这大体是以10年为一代人的划分,也和时代风云的更迭周期相吻合。几代人前后传承,为再造中国文化而努力,同时,他们要直面和解决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难题。改革开放初期,30年代生人创作出“反思文学”和“大墙文学”,50年代生人创作出“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进步作家在个人叙事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上作出明确的选择,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推崇灵感,宣称“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社作家,在落笔的第一时间就选取“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作为其描述留日求学生活

的情绪基调,弱国子民之叹,异路他乡之思,乃至对革命的感应和向往,都见诸笔端。郭沫若、郁达夫等深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从社会生活退缩到个人悲欢、内心世界的狭小天地之中,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叙事融合到国难家仇和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控诉之中。创造社作家们在大时代的召唤下,先后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抗日战争,在雾都重庆创造了其文学生涯的第二个高潮。郁达夫辗转在南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利用给日军当翻译的机会救助许多爱国华侨和当地民众,在抗战胜利之际遭到日军杀害。这样的从文学文化领域进入到社会实践的路径,正与日本“私小说”逆行而行。

纵贯20世纪,将个人微茫家事笼罩于民族大义、复兴大业之光芒的写作,并不少见。我参观过汕头的侨批博物馆,感慨颇深。近代以来潮汕有百万人远行海外,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为大宗,海外华人的血汗钱通过民间兴办的侨批业汇寄给国内的家人。一张张信笺倾诉离别之思,告慰亲人之念,本是个人家务,却因为信笺更替的更替,留下大时代嬗变的鲜明印记:抗战爆发风云突变,信笺上印着抗日救亡万众一心的字样;改革开放洪波涌起,信笺上添加了侨汇利民利国支援国家建设的内容……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的,个人独特命运的故事总是第三世界公众文化与社会严峻形势的寓言,他力图揭示出后发国家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差异,为我们认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参照:与其过分地纠结于民族寓言的使用限度,不如更深入地探讨中外文学中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民族精神的关系。

动荡而艰难的现代转型,并非中国所独有,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曾有过“大时代的文学”。就像工业革命和现代进程加速运转的19世纪,催生出英国的狄更斯、哈代,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俄罗斯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等文学巨匠。而且,他们都是各民族底层人物命运的书写者,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悲欢写出时代的风起云涌。19世纪诸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却都是经历、体察和广泛地描写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巨大历史震荡,让许多野蛮生长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受苦受难的底层贫民成为作品主人公。同时,这些作家也写出了现代转型时代的艰难时世。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阶级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描绘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益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列宁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写出俄罗斯农民在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命运与心灵世界,不仅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写出俄罗斯虚伪腐败的上流社会,还通过列文未能成功的乡村改良写出对俄罗斯农村状况的

深刻思考。

正是秉承这种写时代的编年史的宏大抱负,路遥选取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5-1985年这大转折的10年,将陕北黄土高原上孙家兄弟人生道路的波澜曲折,写成《平凡的世界》,哥哥孙少安经历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承包到户,以及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万元户”的涌现,弟弟孙少平为寻求更为理想的生活而进城打工,改变自身命运,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先行者,让他在极为有限的时空环境下去追求诗和远方。莫言借用佛经故事中的转世投胎、六道轮回,在《生死疲劳》中讲述西门闹、蓝脸、黄瞳及其后人,在《蛙》中讲述姑姑作为计划生育的先锋,让他去执行一项项冰冷的任务,让他去执行一项项冰冷的任务,让他去执行一项项冰冷的任务,让他去执行一项项冰冷的任务……陈忠实的《白鹿原》,从清末民初起笔,朱先生单人独马地化解一场西安城的血腥攻防战,但作品的主人公却是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位“仁义”白鹿村的代表,他们是从青年时代就既合作行善又争斗不休的同宗同族的兄弟,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民间形态。

路遥和陈忠实推崇巴尔扎克,莫言曾经盛赞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梁晓声对雨果爱之入骨,但他们笔下的普通人,却是洋溢着深挚的民族精神:孙少平的忍辱负重“生活在别处”,西门闹不屈不挠地叩问历史真相,周秉昆平凡岁月中秉承的“好人文化”,白嘉轩对关中大夫儒朱先生言听计从实践儒家仁义精神……从不同侧面展现出现代中国人的生态和心态,他们能够恪守心中认定的价值与理想,生生不死地穿越中国式现代转型的漫漫长征,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为民族复兴的伟业留下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股相承的精神追求。着眼于此,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普通人与大时代、个人命运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作出一些新的阐释,并将其提升到“中国式现代转型之大时代的文学”予以初步论述。中国作家对于普通人物形象刻画、普通人物命运述写,因为大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加持,创造了宏大的史诗性作品,讲述了独具神韵的中国故事,从文学的角度提供了新鲜的中国经验,以此而回馈时代与民族,争胜于今日之世界文坛,是值得我们高度肯定、认真研究并深入总结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荣誉教授)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10月以来,王蒙、邹静之、鲍吉尔·原野、张翎等作家带来的新作,以及青年作家持续在多元主题上进行的探索。感受生活的温度与脉动,撷取时间的记忆与祈望。文学的真意在新刊新作不同的主题、题材书写中慢慢显露,如巨浪下的岩石,传递当下的浪涛之声。

生活的温度

以家庭生活为蔓,作家们在芜杂的生活之中寻找一条突破重围的出路。程青的长篇新作《夙舞》(《当代》2024年第6期)以爱为眼,聚焦两位女性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折射出一代人的喜怒哀乐,展现出飘零人生中的顽强生命力。刘汀的《生活启蒙》(《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5期)在现实与往事之间观照未来,讲述中年女性在纷乱的家庭生活中突破重围,汲取力量,重塑自我的故事,生成了一种新鲜的源于微小的生活启蒙。

情谊是生活的见证,生活因此而鲜活,历历在目。钟求是《故事收容室》(《人民文学》2024年第10期)设置了一间承载心事与故事的房间,捕捉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感受,也展现几位女性心灵上的相知相通。姚鄂梅《老姐》(《人民文学》2024年第10期)中,常年抱病卧床的老姐在与丈夫分居后迅速地由黯淡枯萎变得蓬勃旺盛,透过温馨的祖孙相处日常,作家在分享老姐生存智慧的同时也揭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

协奏之中总是难以避免不和谐的音节,但生活正因此产生了跃动的张力。鲁敏《临湖的茶室》(《当代》2024年第6期)中主人公因病成痴,以暴富为由将一群老友召于一室,作家调遣人物,于一方茶室内上演了一场变异的交流,结尾悬念陡起,别出一格。季栋梁《白杨树街》(《北京文学》2024年第11期)语调明快,书写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人与事的碰撞之间逸趣横生,在质朴的寻常生活中浓缩出众生相。

生活在与自然的交融之中而获取生命的温度。《中国作家·文学》2024年第11期“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刊发的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在时代变迁之间书写人与大海的关系变化,大海塑造了充满血性的航海故事,也哺育了斑斓多姿的渔家生活。鲍吉尔·原野《万物眺望》(《中国作家·文学》2024年第10期)以6封信件为主体,通过三对拟人化的习见物象发声,以独特的视角记录草原风景与生活日常,在诗性的语言中揭示少数民族的生存哲学。《当代》2024年第6期推出梁鸿专栏“逆旅人间”第4篇《家有所养》,作家细数家中曾喂养过的动物的生活点滴,书写人与动物联结之下留存的成长痕迹,也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脉络。蔡崇达的《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人民文学》2024年第11期)以文字筑巢安放记忆,记录“我”幼时与家中小动物的点滴相处,并揭示出朴素的真谛:生老病死虽是生命的常态,但只有正视这一部分才能真正地珍惜自我、他人与世界。

流动的时间

写作定格瞬间,也记录时间的流逝,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与作家们栖于一舟,在流动的时间中漂向未来。具体的物象之中蕴藏着过往时间下记忆的厚度。王蒙《高雅的链绳》(《当代》2024年第6期)循“眼镜链”之线上演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传奇爱情故事,以积极而乐观的视角透视老年群体在现代社会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变化,展现出真诚而浪漫的风范。建筑是“进行中的历史”,东安市场承载了邹静之的《断金》(《北京文学》2024年第10期)中三兄弟在动荡不安时代之中的命运交错与起落兴衰,在一代人的悲喜剧之中思考人生“争与不争”的哲学命题。在《青年文学》2024年第10期中,简平《开合的睫毛》以建筑物作喻,在睫毛的开合之间注视当下、沉思过往,阅读建筑留存记忆;侯磊《辽都往事——旧京学者与北京千年建都史》追溯北京自辽都以来的千年建都史,勾勒出北京作为历史与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驻在此刻,作家们在意识流动下尽情构筑想象的空间。盛可以《冰箱上的饰物》(《人民文学》2024年第11期)将故事定格于一张照片,以冷静锋利的语调讲述了由此引发的家庭之中、夫妻之间隐秘幽微的心事浮动,追寻记忆深处的情感变动。梦的象喻牵引着成长的真实,沈念《窃生》(《人民文学》2024年第11期)以儿童视角下的意识流动为牵引,游弋于惊梦与现实之间,小说的情感表述静谧无声,却如潮水般波涛暗涌,拥有深入人心的力量。

言说或行动,都是一场在时间中的游历。宁肯《戊戌:一个人的现场》(《中国作家·文学》2024年第10期)记录作家创作瞬间的感悟,语言、创作与生活彼此相连,作家诚恳而坦率地分享一年间的文事点滴,展示真实的创作现场。王威廉《暗生命》(《十月》2024年第6期)目光长远,通过人类与地外文明的交流,将爱、生命与永恒等命题铺展开来,体现了对科技与社会的深度思考。在青年作家当下的书写中,亦上演着无限的可能。《十月》2024年第6期推出的“00”左右青年写作者专栏与《当代》2024年第6期“发现”栏目,汇集了袁德音、胡诗杨、卢熾、南音、陆皓晖、朱嘉诚、高云天、刘皓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青年作家们的笔触伸向成长主题及其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探讨生命、人性以及写作本身,展示了丰沛的创作生命力。

俯身于大地

如闪烁于浩瀚原野的火,无数先贤在燃烧自我中迈步前行,温暖了大地上的生灵。《人民文学》2024年第10期在“光的赞歌”中推出两篇特选作品,康若《传经者顾锦屏》历数翻译家顾锦屏70载皓首穷经译介列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奠基而奉献一生的经历;李青松《在车八岭森林》落笔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探讨关于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同时,也记录了心怀理想的劳动者与建设者们的前行之路。山眼《观月者》(《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5期)讲述中国女科学家、诗人、旅行家王贞仪的传奇一生,笔调颇具古韵,娓娓道来,将历史画卷铺展于读者眼前。

生活在自然之中,作家们写下来自大地的生活智慧。鱼禾的散文《有情》(《人民文学》2024年第10期)通过对人与草木情谊的描绘,情思细腻地展现了自然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为人类留下的清风般的触觉。从第10期开始,《北京文学》开设“到世界去”专栏,张翎《走进基贝拉——东非散记之一》通过深入探索异域生活,揭示了基贝拉这个城中之城蓬勃的生命力与当地居民的生存智慧。

俯身于大地,聚焦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国作家·文学》2024年第10期推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小辑,具有生活的质感与思辨,凡一平《红棉》讲述陪护与病人之间的善意相待,进一步讨论了老年人的终老问题;吉米平阶《次人回乡》颇具魔幻色彩,以一对雕塑的旅程贯穿始终;少一《偷风》讲述基层干部以巧智化解了一场岭南岭北的居民们因利用自然资源而造成的矛盾,进而造福百姓的故事。

在这片揉去旧叶,唤来新声的秋色里,各大文学期刊推出的最新作品各自酝酿出丰润的果实,无论是当下生活脉动的感应,抑或是对时间的书写,还是于大地间探索广泛的现实人生,这些新作在落英缤纷之中纷然而至,传递着最新鲜的时代讯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评论

丝路上的情与义

——高建群长篇小说《中亚往事》

□常晓军

高建群以宏大、复杂而精巧的叙事结构,在长篇小说新作《中亚往事》中,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中亚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作品围绕主人公马镰刀起伏不定的命运展开叙事,讲述了他在家庭变故中艰难求生、草原遇匪时转变身份、护国为家从戎守边的悲情故事。融历史的厚重与深邃、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于一体,小说在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时代发展的多维表达中,透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叙事学理论来看,作家的叙事视角决定着故事的呈现方式和读者对故事的感知角度。《中亚往事》选择了从马镰刀的家族兴衰切入,逐步延伸至他在中亚地区的种种经历。“马镰刀,那时又叫马明轩,随着家族的轰然倒塌,他被命运的巨手无情地推向了丝路。那是一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的道路,风沙弥漫,盗匪横行,但他只能在这茫茫大漠中,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生存的重担。”重担既是生活、命运之重,也是社会大环境之重。家族无常变故,人生陡然转向,遭遇多舛命运的马镰刀并未屈服于困境,反而在压力下中坚抗争。无论是沦为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客”,还是成为劫富济贫的“草原王”;无论是带领弟兄接受招安,还是心怀家国情怀守土戍边,作家都力图在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叙事风格中,展现出中亚地区宏阔的地理风貌,塑造马镰刀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生。

马镰刀的身份虽然发生变化,却始终传承着家族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努力求变的信念。

从芸芸众生中的“骆驼客”成为雄踞一方的“草原王”,体现了他身上无法磨灭的信念与担当;从位居高位到浪迹天涯的转折,则是个体命运与国家使命的深度交融。一次次身份的转变是马镰刀受内心深处对国家忠诚与责任感的驱使。这样的抉择并非偶然,是对家族荣誉与国家使命的传承延续。只是故事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驻防期间遭遇意想不到的挑战,马镰刀终因失误导致国土被占,陷入极度的自责与困境中。

马镰刀这一形象的塑造是这部现实主义画卷中的核心与灵魂。困境中的不屈不挠,深刻的心灵蜕变,让马镰刀的命运轨迹一如波澜起伏的传奇史诗,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无比坚韧的意志和生存能力,又在风沙肆虐、饥饿煎熬和匪患威胁的蜕变中,表现出坚毅果敢、勇于担当的性格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不仅是中亚地区人民的宝贵品质,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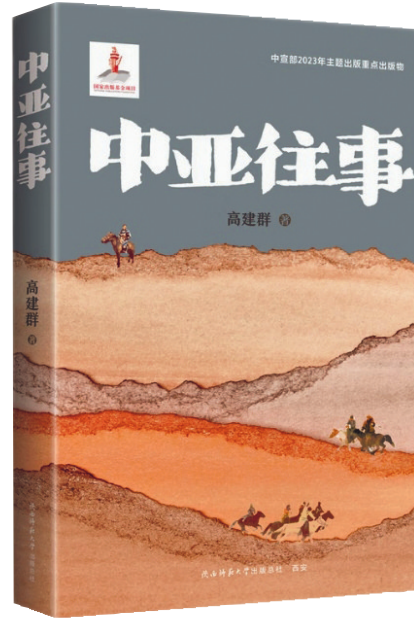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作家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人物,实现了对历史故事的浪漫化解读。尤其是成为“草原王”后,马镰刀的人物性格更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质。一方面,他心怀侠义劫富济贫,以自身力量在江湖中维护一方公平正义,成为百姓敬仰的英雄豪杰;另一方面,他又卷入江湖的纷争漩涡与权力的角逐,“当遭遇其他帮派的蓄意挑衅时,马镰刀本可凭借自身强大的武力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彻底消灭,然而,他却深深顾虑地考虑到这样做可能引发更为剧烈的江湖动荡,进而严重影响百姓的安宁生活。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谈判与和解的道路,在成功维护自身威望的

同时,也有力地保障了地区的和平稳定。”马镰刀不是武夫,他的每一个决策与行动中,有更多的人文与道德的考量。

马镰刀的经历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一众兄弟不同的命运故事,中亚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习俗、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等,是小说巧妙穿插的多条支线。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一改单调的历史编年记事写法,极大丰富了故事的层次感与立体感。百姓与军队间的紧密互动,引领读者置身于鲜活而真实的中亚世界。

《中亚往事》俯瞰丝绸之路西段中亚地区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大地,直面现实又超越现实。巍峨耸立的山脉,静静地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变迁;广袤无垠的草原如绿色浩瀚的海洋,逐渐朝着天际蔓延。简洁而富有意味的描写,赋予作品极为广阔的视野,在“草原似海,骏马驰骋,牧歌悠扬,山脉如磐,岁月无言”中,展示出中亚的雄浑壮美与多元文化的绚丽,但也暗示着人物在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命运变化。

宏阔的视野,是对现实主题的关注,而内在的张力,是心怀天下的气魄和深切的家国情怀。《中亚往事》诠释了领土争端下,人物命运与守土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间的密切交织,文字中传递出维护国家利益时的浓烈爱国主义情怀。马镰刀认定了家族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是祖国边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让他饱含深情。作品描绘的特定时代,正值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之际,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重要通道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不断受到



《中亚往事》,高建群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外部势力和文化影响。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中亚地区面临着新兴列强的冲击。在这种状况下,也就不难理解马镰刀在不同阶段的精神转变,既有着个人不懈的奋斗历程,也象征着中亚地区在大历史洪流中挣扎求存、适应变革的历史镜像。

在文化研究视角的审视中,高建群通过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巧妙反映了中亚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复杂生态。中亚地处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亚往事》看似以中亚地区为背景,但文化内涵却根植于丝路文化。作为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小说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交往,包括贸易往来、文化传播等有机融合。

(作者系武警工程大学教授)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
聆听彼处生活的回响
□刘阳